

访学与访书

——香港城市大学“多闻雅集”纪要（2018年4-5月）

5月9日，天微雨，海棠轩一如既往的安静，但直到下了一楼看见空荡的前厅，才确定大家都已离去，我是最后一个。想起来之前多友陈科跟我说，别觉得30天很长，其实很快就过去了。果然如此。

来城大之前，就读过好几位前辈多友的访学文字，俨然已把“多闻雅集”描绘成一座尽善尽美的“理想国”，如今自己来讲述，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还能讲出什么“增值”的内容？不过，享受完一个月的雅集，当然有义务留下点文字，既是向主办方表达诚挚谢意，也是为后来者提供参考文献，更是为自己珍藏一份记忆，如果硬要给这份记忆提炼主题的话，我愿意将其概括为“访学与访书”。

上：访学记

我们这届是李金铨老师在城大荣退前的最后一班雅集，不知道该说更幸运还是更感伤，但和李老师聚过很多次倒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以上李老师朋友圈的次数为测量指标，那这个取值我们表现确实不错）。不论是正式的课堂，还是私下的闲聊，李老师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据我观察，李老师最让我们晚辈受益的有三点：

一是超越新闻传播的开阔视野。李老师专业立在新闻传播学，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幸福，但他却时刻提醒我们要研习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兄弟学科，而且身体力行，在跟我们交流时经常会有超越本学科范畴的高明见解。例如，李老师谈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时，说人文学科动辄“道可道非常道”，但社会科学就是要“道可道之处”，中国传统文史哲推崇能“引经据典”的人，但社会科学讲究用科学方法搜集的证据，传统文化厉害的地方是有洞见，表达智慧的方式很形象，但缺点是无法用实证办法来证明，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一说大家都明白，而国外社科学者却用实验法来研究：让一个人在大街上做出需要帮助的样子，以其遇见的人数为变量——当一个人经过时是否会帮助，两个人经过时如何，一群人经过时如何，还有对其它相关情境的考察，这就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上升到了“社会顺从研究”的理论高度。

二是对研究方法的兴趣和重视。不论向他请教什么具体问题，他都能将对该问题的讨论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从而抽象出对于所有听众都有启示意义的结论。例如，李老师在港中文教研究方法时，就选了八篇不同范式的论文，从中国文史哲到西方社科都有，让学生对各种范式都要过一趟水。再如李老师谈到文献综述时，告诉我们首先要清楚研究文献是要给我帮忙的，不能被它牵着走，有些学生喜欢引用很多文献以显得自己博学，遇到这种情况，他会让学生把不相干的文献都划掉，因为回顾文献“不是仪式而是桥梁”——勾连自己的研究和前人的研究。应该意识到学术的最高标准是发现研究者的主体性，所以他自己从来没有专门的文献综述这一章，而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编织到自己的论文中。

三是对阅读学术著作的热爱。去李老师办公室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墙上顶天立地的书架，走近一看，以英文著作为主，也有不少内地学者送给李老师的著作。在这一个月的多次交流过程中，李老师反复提醒我们，要读好书，经常读，反复读，还要读那些本学科之外的经典，最好能先专精一门才能触类旁通。何为经典？一是绕不过去，二是常读常新，经典学术著作是你思考的试金石，比如Schudson, Mills等，让他们来激发你的想象力。而且读书要系统地读，李老师自承除了曾读完E·M·Rogers、W·L·Schramm、M·Schudson的全部著作外，还阅读过思想家Edward Said和文史学者余英时的全部著作，他最推崇的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更是读过很多遍，自承常读常新。

在李老师最后一节课上，他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等了半天没人作答，他笑了下，说难道你们上了两学期的课，竟然没有一点疑问？大家都笑了，李老师说做研究不要总是绷

的这么紧，要松弛一点。自己去美国读博时已经有硕士学位，但他还不满足，坚持要从头学起，结果读了七年。要问自己有没有 intellectual excitement？做学术的第一件事就是要 interesting！

第二位学术分享的是同样大名鼎鼎的祝建华老师，以前觉得祝老师最厉害的是他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精通，而这次则深刻地感觉到他在很多流行议题上都不随大流，而有自己的独特洞见。例如，当时扎克伯格身陷 Facebook 侵犯隐私的“丑闻”，祝老师却认为这有点小题大做，甚至是一帮无知的媒体和别有用心的人和政治家在无中生有或欲加之罪，他的判断依据是过去美国公开发行的电话簿有个人姓名与电话号码，每间住宅和车辆的信息可以很便捷地查到，每一位地区登记的选民信息也可以被获取，这些都比 Facebook 上暴露的个人信息要重要得多，但却没人质疑其侵犯隐私，因此没有必要把隐私泛化，或者把 Facebook 上那点信息视为隐私，因为那是你免费使用新媒体所必须付出的。

最后，他谦虚地表示：我们每个人的研究重点不一样，都是盲人摸象，仅得一端；我被认为是“极端数据派”，但其实我是觉得每个学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数据从何而来的问题，然后再是方法，最后才是学科的理论建构，也许是因为自己看得太多，所以感觉太阳下无新鲜事。祝老师还开玩笑说，他的学生总是抱怨说自己报了个觉得很新的选题给他，他每次都说这个不新了，很多年前就有了，因为在做过三十年研究之后，遇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祝老师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历史眼光（history background），就很难看出事情的本质。

除了在五楼会议室正式的学术分享之外，尤其值得一记的是沈菲老师带我们去狮子山的行山历程。我们上午出发，一路边走边聊，竟然没觉得好几公里的山路有多难走，这也许是因为沈老师一直在就大家感兴趣的各种话题娓娓道来，实乃除累解乏、祛除登山疲惫之必备良药。行山时，沈老师遇到其他行山者都会用粤语道声“早晨”打招呼，让我们感受到香港市民彼此之间的善意。走在山林间，我突然想到：行山也许是最适合脑力工作者的运动方式——尽日枯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不如到大自然中让苍翠的山色洗洗眼，让夹杂着植物味道的空气醒醒脑，也许更能激发新的学术灵感。妄自揣度下，也许沈老师在用行山这种方式提醒我们：哪怕有再多读不进的著作、写不出的论文和填不完的表格，也要抽空用脚步去丈量大地，跟大自然多亲近亲近。后来，还有幸去沈老师的顶楼豪宅参加家宴，更让我们感受到超出师生情谊的近乎大家庭的暖意。

第三个跟我们分享的老师是李宇宏。她以前在《东方之子》做十分钟时长的人物访谈，有一天突然觉得为什么不让他们从容地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后来就在城大开了门以口述史为主要范式的纪录片课，她发现这门课其实也是一个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历史的过程，开选题会时简直像开心理诊所，原来大家内心深处还有这么多秘密心结，由此她领悟到：拍纪录片最大的意义也许不在于真的记录下什么，而是对人的成长有帮助。最后，她还引用了周浩的一句话，说有学生问他，原来想着拍纪录片应该能够为自己的种种疑惑找到一个答案，没想到越拍对问题反而觉得越糊涂，为什么会这样？周浩回答说：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混沌的状态，千万不要想着从里面找到人生的答案，想从里面找答案是你出了问题，不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第四个做分享的是日本的小林哲郎老师，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对日本传媒现状的介绍，说日本人更愿意传统媒体而非新媒体，这使得日本国内传统媒体发展还不错，而且日本的报业和电视业互持资本也增强了其垄断性。还介绍了下他自己的经历及其最近的研究，他一直在东京大学读书，后来去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回来后经朋友介绍来了香港城市大学，觉得香港还不错，就待了下来。最近的研究是用实验法证明媒体报道对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关于中国看法的影响。

第五位做分享的是林婉莹老师，她关注的是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领域，特别是情绪与

政治参与的关系，用 Marcus 的 affective intelligence theory 来考察了太阳花运动、雨伞运动中情绪对行为的引导，尤其是传播在里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里面讲的比较有意思的是网络调查 online survey 怎么做？因为它很难做到 sample，为了能够让学术期刊接受 online survey 的论文，林认为首先需要认识和承认该方法的局限性，但还是可以 approach 其代表性，要让编辑 appreciate 你的 effort。还谈到了传播学从各个学科来，所以受到各个学科的制约，心理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讲的是内在效度。最后她讲到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monitorial citizens”不知道怎么翻最好，润喜无比机智地脱口而出——“吃瓜群众”。

第六位做分享的是 Macro 老师，他对我们很友好，平时在学院见到了都会热情打招呼，这次分享的是他所关注的环境传播议题，特别是新媒体使用对于不同人群环境传播观念的影响，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环保主义者，所以很关注这个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最后提问环节，我问了下有些环保人士可能连新媒体都不使用，该研究涵盖了这一类人群吗？Macro 说 no，他关注的是在新媒体使用者群体，而我说的这一类人群确实存在，但并不在他的研究范畴之内。

第七位做分享的是黄冠雄老师，她的研究兴趣是广告和健康传播，对于健身 APP 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因为之前我也指导学生做过同题研究，当时在如何引入理论方面有点一筹莫展，但这个问题对于黄冠雄来说就显得驾轻就熟了，她列举了好几个理论：如社会认知理论，健身 APP 如何促进人们对于健身的认知进而发生行为的改变；再如自我规训（self-regulation）理论，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如何通过跟媒体的互动养成健身习惯；还有健身 APP 的劝服性技术、健身 APP 的社交比较等等，一个现实取径的题目能够牵连出这么多理论，确实很有启发。

第八位做分享的是蒋莉老师，她以前的导师是心理学的，所以她的研究也偏向于这一块，关注重点是 social media 和人际传播，也对语言与文本、健康传播等议题感兴趣，擅长用实验法来测量人与人通过电脑的互动和人与人面对面互动对于亲密关系的不同影响。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她现场交流有很多信息，但通过媒体的交流却只放大了其中一些信息而把另外一些信息屏蔽了，网恋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其过滤了很多信息。还有个比较好玩的选题是关于中国“剩女”的研究，如“剩女的媒介画像”“剩女对于媒介偏见的认知”等。还有对于个人信贷业务中语言表达对于贷款成功率的影响、通过颁奖词的文本分析来研究近些年哪些企业更容易获得某个创新奖等等。

第九位做分享的是梁励敏，她一开始就自报家门说是做文化研究的，立刻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是做实证的，但后面的讲座并没有让我们觉得轻松，反而以一种近乎密集轰炸的理论阐释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思想深度。她讲的题目是 media events as ritual, strategy and deliberation。媒介事件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她讲的别开生面，大大超出了我们对媒介事件的传统认知。首先对标题的解释，她认为这三个概念指向了不同的维度：ritual 是美（传统价值）、strategy 是真（现代价值），而 deliberation 是善（非稳定价值），也反映了三种不同的真实：个案真实、文化真实和社会真实。然后从凯瑞的仪式观开始谈起，认为 transmission 关注的是变，而 culture 关注的是不变。还有个观点很有启发，她说新闻的意义不是事实是什么，而是事实意味着什么？梁老师的分享信息密度太大，当时听得很过瘾，但过后再总结时居然发现笔记本上潦草的字迹好多都认不清了，很是遗憾。

最后一位分享的是李喜根老师。李老师面容慈祥，不论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笑眯眯的。尽管跟我们做分享那天他刚开完一中午的会，但他仍然面不改色，准时到场，娓娓道来：从 2008 年到城大，一直在做新媒体研究，最近感兴趣的是健康传播相关议题，认为做研究要有新的刺激度，即在理论上有所贡献，而不要追逐热点事件。他举自己做的一个“第三人效

果”研究为例，就是发现过去第三人效果的主要变量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信息本身还没有被考察，于是他提出了“不同性质的媒介内容会导致第三人效果发生差异”并设计了一个实验，将雾霾议题和全球变暖议题的新闻内容给随机分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看，然后通过统计检定发现研究假设成立，这就进一步拓展了第三人效果理论。

上述内容主要是基于自己的笔记和回忆（如有错漏，责任完全在我），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届多友指正。其实，除了上面正式的学术分享活动之外，我们还参与了不少非正式的学术活动，例如博士生的课程，外来专家的讲座等，都有所收获；更自行组织了随时随地的学术交流，大家在沙滩边、在海岛上、在茶餐厅里、在地铁中、在街道旁、在树荫下、在散步时无拘无束地讨论对各类研究命题的见解，都让自己觉得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学术之旅。

下：访书记

相信每位多友都有香港买书的经历，但可能与其他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更喜欢去旧书店或二手书店淘书（说得文雅点姑且称为“访书”）。到城大的第一天晚上，就按照 Google 的检索结果，列了个清单，准备一家家打卡。

第一天晚上，就和润喜一起去的最近的“我的书房”，这是一家非常典型的香港旧书店：门脸小，书塞得满满当当，过道窄，里面结构错综复杂，书籍分类大致准确，但还是要靠自己一架一架地看，书价要选好之后拿给老板估，老板接过书掂量下，就很随喜地报了价“40, 50……”，感觉一般看新旧和厚薄，报价是原价的四到五折，买的多会稍微便宜点。难得的是，这家拥挤的书店竟然还有“洗手间”这么个国内很多大新华书店都没有的高级配置，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逛书店找不到厕所了。这次的惊喜是挑到了台湾编的《中国新闻文学作品选》（先看见了第一册没感觉，后来看见有第二册，打开一看有李金铨老师的早期作品，果断拿下），最终挑了四本书一共 170，对于港版书来说不算太贵。出门时已经近十点，顺口问老板几点关门，老太太微笑着说没关系，你们看完我们就关门，还告诉我们，前面还新开了一家分店，两百米，我们决定明天一探究竟。

第二天到了另一家“我的书房”，这家新店最厉害之处是里面的书竟然跟老店没什么重复，进门主要是各类文学书，再往里面就是历史哲学，一楼文史哲为主，二楼则是各类杂书，淘到了《地标：北京建筑的政治地理》《我的父亲罗孚》等，遗憾的是看见上下两大册港版的唐德刚《李宗仁口述史》，那天买的书有点多，想改天再来取，结果下次再去就没有了，这也提醒自己遇到心仪的书一定要拿下，宁可错买，不可错过。离海棠轩最近的这两家“我的书房”成了在港的三十天内去得最多的旧书店，特别是临别前，几乎每晚都揣点钱换上跑步装备跑个两公里到书店逛一圈再跑回来，香港适合夜跑，更适合夜跑到书店去淘书。

除了这两家店外，收获最大的是太古集团举办的“书出爱心，十元义卖”书展。偶然得知要具备这次义卖，虽然远在鲷鱼涌的太古大厦，还是义无反顾地赶过去了。到了才发现这是借了高档写字楼的公共空间搞的活动，整个卖场分成 ABCDE 五个区，每个区对应不同的图书类型。其中 B 社科区和 C 文艺区是我去得最多、待得最久的两个区。因为全是十元一本，所以全然没有价格的顾虑，唯一就是需要和其他人抢——到了现场才看见很多人都是拖着行李箱有备而来的，而且还见到几个熟悉的面孔——之前见过的二手书店老板。第一次去大开眼界，很多之前的畅销书都是差不多一折甚至不到一折的价格，于是顺手买了《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唐山大地震》和张五常的《卖桔者言》等几本。虽然都是捐赠的图书，但质量和品相都不差，好像在其它地方没有见过类似活动。

整个义卖持续四天，我去了三次，每次都提醒自己不要多买，但每次都是提着十多本书满载而归，因为总是能见到无法拒绝的书。最后一天突然想到 E 区还没去过，因为 E 区不在活动的主会场二楼，而是在另一幢大楼牛津大厦的四十几层，一进去才发现这是一个几百平米的大平层海景写字楼，里面是所有没有分类的书，每个书摊前都围着密密匝匝的人群，

从未见过如此高大上的二手书摊和如此壮观的购书人群。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里的志愿者，其工作细致程度堪比五星级酒店，比如，每个展位前都站着志愿者，一旦有人选中了展位上的书拿走，他们立刻从后面纸箱里面抽出书来放进空位，这就保障了书桌上的书不断轮换，总有新上的。事实上，我每次去同样的区域，几乎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书。

有一次去到新亚图书中心，这里名气虽然大但好书并不多，不过淘书的乐趣正在于此——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沙中淘金的成就感，有开阔眼界的收获。绕了几圈，找到一本港版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新闻工作坊》，于是拿书递给柜台后的老太太问多少钱，她颤巍巍接过去，翻到倒数第二页，指给我看淡淡的铅笔字：“三十五”，年纪这么大，真不忍心还价。这时有声音问我“找哪方面书”，我一看是个男文艺青年，就跟他说要找社科文史方面的书，他低下头沉思了下，说深水埗有个“新天”可以去看看。

后来，自己专门去深水埗找“新天书业”，这家书店外面挂满了各种类似政治标语的条幅，里面有不少社科方面的书，但书架和书架之间的间隔非常小，只能侧身蹲下来，费劲地去看，但也没太多惊艳，只找到一本《李维史陀》，还有一本《重庆大厦》之前听李老师说，台版的陈丹青《外国音乐在外国》全彩插图本，装帧印刷都比国内版好很多。还有一本《刘宾雁作品选》，特别像盗版，因为里面不同篇章的字体都不一样，出版社是香港一家文学社，主要是没看见任何序或者跋，所以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

后来还跟曹洵一起去找柠檬书局，我们从庙街出发，穿过长长而低端的夜市，终于在一幢毫不起眼的大楼一楼电梯间的楼层铭牌上看见了“柠檬书局”的字样，于是排队入梯，出电梯后看见小小的书局门牌挂在一家普通人家门口，进去后见到很奇特的格局：一个年轻人睡眼惺忪地坐在屋正中的办公桌前，四周墙上全是簇新的书，我随便一看要完——基本上都是教学辅导书，奇怪的是，之前查的网站介绍是文史类二手书啊，于是让曹洵问了下老板，他说没有分店，就是在卖教辅，这也算唯一一次走错庙门。

相比之下，附近的几家小书店如“田园”、“序言”等却各有特色，有一家在七楼，进到书店里面，看见有好几本专业英文书，都20一本，还有《去西方化的传播研究》，我买了中文版，本想买的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家里买的英文书看了几本呢？快快放下。出门后看了一眼那个被贴满各种广告的电梯门，决定走下楼。还有家书店主营新书，但也有特价书，只不过把特价书都贴了黄色标签，点缀在新书架上，也算一景，淘了本台湾赖瑞和的《杜甫的五城》，十块钱。

除了二手书店，我们也会去商务、三联等正价店，一般都是看见好书就在群里分享，于是也经常一本书一露面大家就纷纷要求代购。还去过几次诚品，主要是看有哪些新书开阔下视野，因为并没有特别急需要买的书，所以逛起来没有什么使命感，随便看看反而轻松，特别是看见定价后，偶尔会遇到自己在旧书店花一半甚至更少钱买的书，会更开心。有时候也会感慨，那么多研究中国内地的专著，内地却无法读到，真有点枉费了作者的苦心孤诣。

有次大家集体去办清税之后，顺道去找皇后大道中的flow bookshop，一群人费尽周折才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三岔路口找到了这家二楼书店，进到里面之后，发现这家店以外文书为主，中文书大概有三个书架，以解放前后的老版为多，而且定价惊人，看来是一家特色店。在里面找到一本荷兰人写的《文化大革命史》比较有特色，因为是从平民的角度来写的，推荐给渊渊买了，曹洵找到一本解构主义大家的代表作，之前自己见到了，但不知道作者的赫赫盛名所以没买，看来买书确实需要眼力。

离别前几天，我还专程去西营盘找到了“时间书店”，这家没被扫过的书店果然还有些宝贝，但给自己定的规矩是只买内地买不到的书，能买到的书再便宜也不动心，于是放弃了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而选了好几本内地不可能出版的书（像《萨德》的思想传记），另外还给其他多友拍照了书架，他们遥控我下单，这种帮人买书的感觉也不错。结账时问要不要塑料袋一块钱一个，我自己的不够大，就问买了这么多不能送个塑料袋吗？答

曰之前被罚过一千块，因为香港不允许提供免费塑料袋。

临走前两天，和赵茹一起去黄大仙庙，出来后顺便去找附近的“解忧旧书店”，结果走了两公里，还是没找到，于是打电话过去，老板说不好意思今天不开门，因为每周六休息，这是唯一一次寻书店不遇。于是只能转去附近黄大仙中心里面的天地书局，也转了半天才找到，给润喜配齐了钱理群的一套书，买单时一位络腮胡的小白胖子（很像《煎饼侠》那个配角）看我们挑的书后跟我们搭讪，问你们买这些书可以过关吗？我们说应该没问题吧，这本书还好，不是民族宗教政治人物传记等，他说我教你们个办法，用衣服把这本书包起来，放在行李箱里面，如果别人来抢你就抱住，不要给他。

临走前一天，还去香港大学找到了“精神书局”，这家店的地址也很奇葩，在一群居民楼围成的三角型内侧，我围着三栋楼走了一圈才从两栋楼的缝隙中看见书店招牌，进去之后老板照例微笑招呼，然后迅速扫了一遍，畅销书居多，只看见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行，后来找到一本《媒介概念十六讲》感觉有点像卡尔维诺《文学演讲录》的体例，因为并不是像国内什么是媒介，什么是受众这样常规的写法，而是换了一种抽象概括的主题集成方式，如：语艺、诗学、爱欲等，令人耳目一新，所以就拿下了。

在每次访书后，我都会向各位多友拍照展示自己的收获，马上就有人要求提供复印本，于是就很得意自己挑书的眼光。最后，大家提议把自己买的书都拍照发到群里，不论哪本书只要我们中间有人买了，就相当于大家都有了，这种感觉真好，提前进入书籍的共产主义社会。

十六世纪神学大师安多尼曾言：学问若不转向爱，又有何价值？的确，访学和访书都是以访为媒，让我更爱这座城市、这所大学和这里的人。当然，除了访学与访书之外，这次香港之行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记忆：美食、购物、海岛、沙滩、行山、会友、游泳、夜跑等等，特别是与同届多友结下的情谊，“人所有的，我都有”，我们确实是一个团结有爱的“强关系”，按常规应该隆重介绍下最亲爱的同届多友，但学文学出身的对文字总有份警惕，觉得文字在描述他人的同时也难免“异化”他人，最好还是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在此就不赘述了。

理想中，人的一辈子也应该像这次多闻雅集一样，每天都尽情享受求知和探索的欢愉，离开时了无遗憾。

